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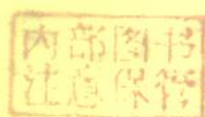


論 當 代 革 命

[英] 拉 斯 基 著

朱 曾 汶 譯

內 部 讀 物





論 当 代 革 命

[英] 拉 斯 基 著

朱 曾 汶 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5 年 • 北 京

Harold J. Laski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Viking Press
1943

內 部 讀 物

論 當 代 革 命

〔英〕拉斯基著 朱曾汶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97 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3017·82

1965 年 1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298 千字
印張 13 $3/16$	印數 1—4,000 冊
定價(9) 1.60 元	

譯 者 前 言

《論当代革命》，是英国工党“理論家”拉斯基(1893—1950)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43年，到1946年，仅战时发行的所謂“經濟版”就銷了四版，是拉斯基著作中銷行較广、影响也較大的一本，被美国《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列为拉斯基的代表作。同时，从这本书所闡述的理論和立場观点来看，也是最集中、最露骨地反映了拉斯基的思想全貌，可以說是集拉斯基后期的反动思想的大成。

拉斯基写此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那时法国敗降，英国面临德軍进攻的危險，正处于生死存亡千鈞一发的关头，国内的阶级矛盾由于强敌压境而暫告和緩，出现了“举国一致”御敌的虛假局面。統治阶级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不得不向人民作一些微小的让步。就在这种情况下，拉斯基提出了他写本书的主旨，那就是：在从战争开始到胜利結束的那段时期內，是实现改革的“千載难逢的好机会”，在战争的压力下，可以不經過剧烈的内部冲突就实行种种根本改革。

然而，凡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会明白，拉斯基的这个“主旨”，是建立在多么荒謬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战争时期，英国的生产关系不仅沒有絲毫有利于人民的改变，而且战争的需要反而使生产大权更加集中在少数垄断資本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統治阶级会同意实行損害他們根本利益的改革，那只能是欺騙。

貫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同意的革命”。拉斯基最害怕

暴力的革命，认为一使用暴力，民主和自由就没有了，而他心爱的社会秩序也就完蛋了。所以他拚命诋毁伟大的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描绘成一个恐怖世界（这一点在拉斯基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时代的难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时刻意抬出一个“同意的革命”来与十月革命相对抗。所谓“同意的革命”，概括地说，就是“用和平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在“各阶级人民充分合作”和“一致同意下重新确定共同的生活目标”。这种“同意的革命”由谁来领导呢？统治者！因为拉斯基自己说，如果领导人不利用人民要求重新确定国家目标的激昂情绪，就是怯懦，子孙后代不会饶恕他们。“革命”而竟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意，由统治阶级自己来领导和实行，这不是荒乎其唐的奇谈怪论吗？

因此，究其实，所谓“同意的革命”，主要是站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说话，维护现实的统治。显而易见，拉斯基的真正意图，只是想实现一些温和的社会改革，企图给人们一些小恩小惠，借以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甘愿做资本家的忠顺奴僕。他在书中强调说：“从历史意义说，对付革命的威胁只有一策，就是实行革新，给人们以希望和鼓舞，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段话，也就是拉斯基的“理论”的全部奥秘了。

总之，《论当代革命》用了大量的革命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真面目。拉斯基主张战后的世界应由英、美两国来共同领导；更异想天开地建议到中国全境进行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而美其名曰“帮助开发落后国家”，于此，他的帝国主义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予以严肃的批判。

本书是根据美国海盜出版社（Viking Press）1943年版译的，

但曾根据英国 乔治·艾伦和昂温书店 (George Allen & Unwin)
1946 年版校正。

譯 者

1964 年 9 月 1 日

目 次

序言.....	3
第一章 論时代精神.....	5
第二章 俄国革命.....	42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意义.....	91
第四章 陷于困境的民主国家.....	138
第五章 民主的内在条件.....	177
第六章 国际形势.....	226
第七章 反革命的威胁.....	279
第八章 計划化民主国家中的自由.....	338
譯名对照表.....	408

序 言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应大大归功于我的朋友們，特别是归功于在克拉克孙大街 17 号所进行的那些无穷的辯論，在那里，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同居的疏散者們和我逐点地討論了本书的各种問題，直到听了午夜的新聞，我們从分析原則轉到估計局势为止。其次，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我的学生們也有不少功劳，他們在伦敦經濟和政治学院的研究班里力图了解他們正在为之奋斗的东西以及怎样才能使后代的学生免遭战争的灾禍。书中很多地方是由全国各地的工党會議上向我提出的各种問題和批評所决定的，还有就是我在兵营和飞机場所作的讲演，在那些兵营和飞机場里，陆空战士們的坚决詰难使我懂得，克伦威尔的鉄騎軍如何成了一件不可战胜的工具，一支有思想觉悟的軍隊。我还要补充說，本书不小一部分理論乃是我国每一个公民在閃电战期間成天目击人民表现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剛毅精神时以及看到俄国人在一次仿佛几乎使文明灭亡的威胁面前所作的英勇卓絕的抵抗时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的产物。此外，我还留心观察了罗斯福总統怎样巧妙地教会美国人民懂得他們只有为自由服务才能够当家作主这一教訓，这自然也使我得益非浅，但願我沒有誤会他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使問題的性質昭然若揭之前那么出色地与之战斗的反对派的重要意义。

我必須指出我从 E.H. 卡尔教授的著作，特别是从他的《和平的条件》一书，还有从馬克斯·勒納教授、伦納德·胡尔夫和金斯萊·馬丁的著作中学会了多少东西；其次，从我同我的朋友路易·

累維、安德烈·拉巴特和費利克斯·格旺的談話中，我也懂得了不少造成出賣法國的原因以及法國將據以革新它的人民曾大力幫助形成的文明傳統的那種精神。

本書開始寫作於戰爭的第二個月，完成之日，議會剛開始討論復興問題，威廉·貝佛里季爵士關於社會服務的報告至少提供了一個重要標準，我們可據以判斷英國政府究竟在什麼程度上真正打算使四大自由成為下一代的部分遺產。對於書中所寫的一切，我只消補充一句：在我看來，威廉爵士的精辟分析的全部主旨加強了本書所作的結論，即我們必須在從現在到取得勝利為止的這段歲月內作出重要決定，我們能否用勝利來實現偉大目標就要以這些決定為轉移。如果我們等到勝利以後再來選擇，那就會把歷史上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付諸東流。

我把本書獻給兩個朋友，這些年來，我曾經和他們在一起度過許多憂愁和歡樂的時刻。我要特別着重說，我們的國家對 E.R. 默羅先生感恩不盡，我知道提契納先生是不会有異議的。從戰爭爆發以前直到現在，默羅先生孜孜不倦地做了只有勇氣和正直才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他的美國同胞對我國所發生的事情有深刻的了解。不少英國人從他對我國人民的忠實和信任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堅持到底和希望的力量，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最後，和過去一樣，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如果不是得到我的妻子的幫助，這本書就完成不了。其他我就不再多說什麼了，因為她不會允許我多說。但我至少可以記下我的一點體會，那就是：患難相共，情愛彌深。

哈罗德·J. 拉斯基

1942年11月27日于

艾塞克斯，小巴德菲尔特，庄园別墅

第一章 論时代精神

—

我們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它也許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最深刻的一次变革。除非我們承认它实际上和羅馬帝国崩溃的时期、宗教改革后資本主义社会誕生的时期或如在 1789 年中产階級引人注目地上升为統治階級的时期同样重要，那我們就将无从理解它的本质。

这不是一次由思想家們制造出来的革命，虽然他們当中有些人曾預知它的到来，甚至画出了它的方向的巨大輪廓。这也不是哪一帮政治家們一手造成的革命，尽管他們当中有些人曾有意无意地加快了它的到来，助长了它的声势。它的本质，恰如它的不可避免性一样，在于使我們的社会具有目前的性质的那一切事物。我們当然能够觉察它的到来并为它作好准备；如果那样，我們就能够建立一种比以往任何一种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和牢固可靠的文明。要不然，我們也可以拿定主意打退它；如果那样，我們的子孙后代就会以为我們这代人宁肯抗拒时代的潮流而不敢违抗人的法令了。

在每一个革命时期，实行基本改革总免不了要发生瓦解和冲突；而且这些瓦解和冲突总是被归諸于坏人的一意孤行，而不是归諸于那些較深刻的客观原因，这些原因是坏人所掌握不了的，而且坏人只不过暂时体现了它們而已。同样，我們总是不肯动脑筋去找出那些客观原因，却一味寻求某种现成的和不三不四的药剂，这种药剂至少对于我們这个时代來說，会把疾病的那些明显的和更

痛苦的症状暂时掩盖起来。从凡尔赛和約迄 1939 年 9 月 3 日^①为止,“après nous le déluge”^②一直是英国每一任首相的座右銘。他一直滿足于喊几句有魔力的口号,其实他却至少應該实施无情的診斷才是。因为,只有了解了疾病的性质之后,才能够担負起治病救人的艰巨任务啊。

据說,我們时代的毛病,是出在坚持已經过时的国家主权原則上面;如果政治組織单位和經濟生产单位取得一致,我們就一步登天啦。也有人說,救治之道在于改良教育;据說,我們是在訓練我們的人民在一个垂死的世界上生活,而不是設法訓練他們的头脑,使他們到那个掙扎着要誕生下来的世界上去生活。有人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能够使人們了解他們的遗产的意义,一种更新更好的精神就会統轄人类的命运。另外有些人认为,我們的病根在于宗教精神的衰退。他們断言,不恢复信仰,就无从确定文明行为的准則,只有这种准則才能在人們中間維持一个文明的目的。还有人以为,“ne pas trop gouverner”^③这句著名格言是我們获救之道;我們的病根在于政治家們过分热中于控制国家的每一部分。只要政府重新恢复商人做买卖的自由,我們就能进入一个創造性的新时代,战争和不安全都能永远消除了。

当然,上述这些救治方案,每一种都有点道理,尽管它是片面的和支离破碎的。誠然,一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从战略意义上說,是和世界市場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为了自卫,不得限制世

① 按这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对德宣战的日子。——譯者

② 法文:“在我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这句话相传出于荒淫无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之口。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一面是宮廷中的穷奢极欲、歌舞升平的生活,一面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这句名言深刻地暴露了他只顧自己享乐,不管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譯者

③ 法文:“別管得太多”。——譯者

界市場由于其固有性质而提供給我們的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在經濟方面，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使我們重新犯下重商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显著錯誤，从而当我們的机器的內在邏輯要求我們为丰富产品訂計劃时，反而訂出了限制性的計劃。但是，訂限制性的計劃就是奉行一項必然不利于我們邻邦的政策。邻邦一定会抵制，而且，如果力量够得到，也一定会千方百計把它的影响縮小到最低限度。但是，从主权方面說，如果它們力量够得到的話，它們使用的手段就不外是以战争相威胁，或者真正动手打，这样一来，那些把国家主权原則和战争联系起来的人，就有了有力的例証啦。

然而那不过是一个片面的例証而已。因为，即使對我們生产制度的外部压力由于取消国家主权而告去除，羅馬和美国的历史仍然清楚地表明：在沒有其他基本改革的情况下，內部压力还会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将导致深刻和剧烈的冲突。毋庸否认，一个沒有主权国家毒素的世界，無論从哪方面来看，都比我們目前的世界强。但它仍旧沒有解决摆在我們面前的种种重要問題，仍旧要去决定把它的力量用在哪些目标上面。

我們需要更多的和更好地适应于现代特征的教育。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公民观念，就不会否认这种需要。我們人口的絕大部分是和我們的文化遺產风馬牛不相及的。他們活在世上根本不知道那些决定他們命运的势力，在危急关头，他們很容易就上了随便哪一种大事宣揚的騙人政策的当，只要告訴他們毛病出在哪一个人或哪一帮人身上，他們馬上就向那个人或那帮人开火了。他們几乎沒有受过訓練来明明白白說出自己的要求。他們渾渾噩噩过日子，那条把他們的心理习惯同那些統治他們的人分隔开来的鴻沟，意味着他們彼此間多半不能互相了解。

可是，新的教育精神并不是一个和物质环境无关的因素。人

們不能指望它在真空中實現。他們必須準備承認缺乏這種精神所引起的弊害，而具備這種精神後所帶來的改革又必須保證能受到歡迎。這種精神所以遲遲沒有產生，是因為恰恰在這兩點上存在着疑問。既得利益蓄意要使愚昧永久保存下去，而愚昧卻正是我們文明的痼疾。除非我們決心向既得利益進攻，就無法擺脫愚昧；而種種迹象表明，如果我們着手進攻的話，既得利益是會頑抗到底的。

宗教精神的衰微是普遍存在的。但我們如果想恢復宗教信仰，就必須鄭重其事地給我們所用的名詞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如果我們指的是恢復對神的信仰，那麼事實證明，特別是在各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教義形式方面，這是辦不到的；因為它們那種提出合理憑據來證明自己確有資格被信仰的能力，正隨着人們對宇宙的科學了解的每一進展而愈益削弱。此外，在人類經驗中，沒有一種殘酷的方式是宗教精神所適應不了的；有人指責教徒們，基本上一直滿足於眼看宗教對人民起鴉片煙的麻醉作用，這種指責是很有道理的。還有，人類知識中任何一種偉大的進展，都遭到過古典宗教的竭力反對，直到這種進展的真理如此明顯，非想出某種羞答答的通融辦法來不可。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某種宗教教義影響常人的社會行為的能力，那麼對這種主張的回答很干脆：他們作為教徒的行為假使不比一定時代中一般人的行為壞些，至少也不見得好些。

但如果宗教精神指的是堅持人們除了個人滿足之外，還要獻身於一個目的，那麼回答肯定是：當代一切偉大的運動都能激起一種以宗教精神為主的為事業奮鬥到底的品質。我們無論研究社會主義的歷史也好，研究使中國和印度、西班牙共和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復興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也好，必然會發覺使這些運動能夠存在的根源都不外是：儘管它們犯有許多錯誤甚至罪行，它們

却能够博得人們的热烈信仰，使人們發揮一种极端大公无私的精神，这种能力始終是一切宗教获得成功的秘訣。除了在这一意义方面之外，宗教精神的衰微是各种历史原因的自然結果，现在已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改变。

当然，除非是世界重新退回到各种野蛮势力互相角逐的混乱时代。它可能会这样；那时候，一小撮信徒就可借助于五花八門的神秘教来逃避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罪恶，这些神秘教的真相只有那些亲身体驗过它們的意义的人才会明白。但如果我們的世界能够为它自己安排一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問題就在于怎样去設法利用各种伟大的宗教总是能够释放的感情上的力量，使之为那种有秩序的合理生活企图实现的目标服务。一句話，那些在历史上著名的宗教的信徒們所觉察到的衰微，乃是正在进行着的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一切政府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們用敌对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我們所能預知的一切情况下，政府的存在乃是和平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所謂我們被政府管得太多（特别是在經濟領域內）的論調，却是叫人难以容忍的。只有在一個其基础為人們一致同意，而經濟又普遍相当稳定的社会里，管得少些才意味着自由多些；在一个对其基础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同时又存在着以大量失业为例証的經濟不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对那些掌握着經濟命脉的人，管得少才意味着自由。

那些攻击政府干涉經濟領域的人往往忘記了，实行干涉主要是由于体会到过去缺乏这种干涉所致。我們所知道的控制，無論是在劳动条件方面、証券市場发行証券方面或者营造权方面，都是出于私人利益自由竞争从未导致过良好社会秩序的經驗教訓。这种情况可能被掩盖相当长一个时期，例如当美洲大陆的广大資源

破天荒第一次被机器操作开发出来的时候；但是，一旦社会成熟了，像别处一样，那充满机会的国土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就成了失败的国土，除非我们能控制住那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使它为一个一致同意的社会目标服务。商人们曾有过整整一个时代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为社会目标服务；即使今天，除苏联之外，商人仍然绝对是国家机器的主人。然而，在这个时代，他们的那种使人民相信他们要求不受政府管束是对人民有利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显著地削弱了。

商人们从来不埋怨旨在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干涉；关税、津贴、出口奖励、特种信贷，只消举出少数几个例子就够了，他们是绝对不会不赞成的。商人所反对的干涉，不是企图给消费者以保护，就是给劳动力市场中的非特权阶级以保护。为了反对这种干涉，商人们乞灵于那些“经济法则”，而且由于醉心自由，竟把它们和自然法则等同起来了。但是，他们忘记了，经济学的“法则”实际上只是从一个依稀地以我们当今的世界为蓝本的抽象社会的逻辑中推断出来的。在那个抽象社会里，竞争总是完全的，劳动力总是机动的；在这个幸福的概念世界里，一个矿工今天失业，明天就可以奉市场的命令当一家纱厂的经纱工，这个市场的作用他和他的雇主都总是同样地了如指掌。

商人们所依恃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别人为他们制定的战斗纲领，这些人代替他们抒述己见，反对腐朽封建社会的保卫者。他们确定了某些假设，这些假设，经济学家的权威从亚当·斯密^①直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都认为是天经地义，那就是：生产资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的代表人物。

——译者

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

料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机构无论经营什么都一定比私人企业经营得差；立法权是为公众利益着想；每个人都最熟悉本身的利益，而且最有条件来促进这种利益。

这种经济学主要制订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眼界不断开阔，乐观主义不断增长，对“无形的手”的不可避免的恩惠充满了信心。这种经济学目睹新人们向权力的道路飞速前进，以致难得停留下来考察一下社会为他们的前进所付出的代价。它一点也不知道继承来的财富的影响，不懂垄断，更不懂金融公司的奥妙或者在我们时代业已支配经济舞台的金钱势力。它承认了金本位制的无可避免的效力；它确定了普通投资者获得秘传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事实上是少数特权分子的专利品。它骄傲地宣称，它的制度意味着消费者的主权，而不问它的分配方法对于社会有利到什么程度。它甚至扬言制度的魅力就在于每个合作者都能从大量财富中恰恰取得他所“值”的那一部分。

可是，透过这一切来看，问题就在于它的论据能说服成功者，却说服不了那些享受不到制度好处的人。只要它那生产赚钱的能力扩展开来，它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奉行它的信条；政治家们被迫作出的让步限制了公开表示出来的不满情绪的数量。但一旦那种能力开始削弱，让步的政策威胁到成功者的特权，不满就逐渐扩大到革命的规模。那些享受不到好处的人就开始攻击，不是攻击所给与的让步的数量，而是攻击让步所依恃的那种制度本身。他们看到的社会，与其说是无形的手奇迹般制造出来的融洽，还不如说是傻子佩利（“Pigeon” Paley）所看到的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没有经济干涉的世界去，无异对十九世纪中叶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代表者主张说，英国必须恢复封建经济的原则。历史不让人們舒舒服服地逃避遗产。